

我逐渐与这片土地同频共振

——一名斯里兰卡籍青年汉学家的十年求索

安喜乐文/图

半个月前，我前往山东青岛，参与由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、北京语言大学联合举办，青岛世界汉学中心承办的第四届“问道中国：‘新汉学计划’博士毕业生研习营”。作为本次研习营青年导师，与这批优秀青年学者交流成长的过程里，我愈发体会到“新汉学计划”项目深远的育人价值与中外文明交流意义。返程上海的高铁上，心生诸多感触，遂落笔成文。我希望借助文字，展现海内外青年汉学研究者的所思所行，让这份跨文化求索的声音被更多人听见。

从2012年第一次踏上中国土地，我在这里完成了本科与硕士学业，而后回到斯里兰卡，在科伦坡大学孔子学院从事汉语教学与标准制定工作，真切感受到自己正汇入中斯文化交往的时代洪流。然而工作越深入，困惑越清晰：我教得了汉语，却尚未真正走进中国研究的学术腹地；我看得见巨变，却读不懂背后的逻辑。经恩师推荐，我通过“新汉学计划”进入北京外国语大学攻读博士学位；如今，又在“新汉学博士后培养计划”支持下，来到华东师范大学继续学术探索。正是这段跨越十多年的旅程，让我从一个学习中文的人，真正成长为一名通过中文研究中国、讲述中国的人。

从“学中文”到“研中国”

“新汉学计划”是促成这一转变的关键桥梁。读博期间，我第一次在官方系统中被定义为“准汉学家”。坦率地说，最初听到这个称谓时，我内心更多的是惶恐——我何以被称为“汉学家”、又何以成为“新汉学家”？

那时的我还不知道，这个头衔不是一个身份标签，而是一条需要一步步走出来的路。

在北京外国语大学攻读博士的岁月，是我学术生涯中最关键的成长阶段。“新汉学计划”构建了一套完整的培养体系——从课程学习到田野调查，从学术会议到研学活动，它让我逐渐明白：汉学家不是关在书斋里“读中国”，而是要走进中国社会“理解中国”。

从“学习中文的人”，到“通过中文理解中国、研究中国、讲述中国的人”，这一转变，离不开时间的沉淀、现场的感知，以及具体的人之间真切而深入的互动。

走进田野，看见真实的中国

“新汉学计划”为我们安排的不仅是课堂与书面论文。它让我走进江西赣州参加“绿色乡村行”研学活动，在县级高中为学生们教授英语。

那是我第一次直面真实的中国乡镇教育，教室里坐着的每个孩子眼中都闪烁着对知识的渴望——那种眼神，我曾在斯里兰卡乡镇青年的脸上见过无数次，如出一辙。

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：中国的故事不只是北上广深的高楼大厦，更是千千万万个这样的小城、小镇和普通人。读懂中国，必须读懂这些人。

后来，我又在浙江五四村参加研学，亲眼看见“中国式现代化”在基层社会的真实注脚——数字赋能乡村治理、集体经济带动共同富裕，那些写在文件里的政策术语，落地之后变成了一条条硬化道路、一个个乡村图书馆、一份份村民分红。理论在实践中获得了生命，而我从观察中获得了理解。

从云南昆明到福建厦门，从北京到上海，从江西赣州的乡镇课堂到浙江五

四村的田间地头，我走过超过25个省份。我不再是一个外部观察者，我融入了这个国家的生活，也在这个过程中，逐渐成为一个与这片土地同频共振的人。

“新汉学”之“新”在何处

传统汉学常将中国视为一个遥远的“他者”，进行文本式的观察。学者们皓首穷经，却可能与真实的中国社会仍有一定距离。而“新汉学”之“新”，首先在于研究主体的转变——我们不再是站在外面看中国，而是走进其中，与中国学者、中国民众在同一文化脉络中共同求索。



“新”还在于研究方法。不只是在书斋中埋头钻研，更要走进田野、课堂、乡村和普通人的生

活。“新汉学计划”打破短期访学的模式，让海外学者通过长周期的田野考察、基层实践等沉浸式体验，深入中国社会肌理。这种“扎根中国大地”的研究，有效消融了文化隔阂。

而最重要的“新”，在于中国文化内在精神意蕴所引致的研究伦理——学会“像弱者一样感受世界”——这不是放弃力量，而是放下傲慢；不是停留于同情，而是真正理解那些不容易被看见的处境、声音和经验。只有当我们愿意站在普通人的位置上重新看世界，学术才会有温度，知识才会有良知，文明交流才不会成为空洞的口号。

“新汉学”之

体中彼此启发、相互交流，让汉学研究从单向的“西方看中国”转变为多元文明共同“参与理解中国”。

我眼中的“青年汉学家”

中国哲学中有一种追求，叫“圣人之学”。《礼记·大学》说：“欲诚其意者，先致其知；致知在格物。”从格物、致知，到诚意、正心、修身，再到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，这条由内而外的成长路径让我深受触动。在我看来，研究中国的人至少需要具备三方面的素养。

第一，把学习理解为修身。知识不仅用来改变命运，也用来安顿内心。汉学研究的核心追求，皆可由此窥其大义。我们研究中国，不是要把中国当作一个标本去解剖，而是要在求知中完善自我、在理解中扩展心胸。

第二，用多元尺度理解世界。不要只用收入、职位和速度衡量人生。一个人真正的富足，来自他是否能理解差异、欣赏繁华，并在变化中守住自己的内心。研究一个国家同样如此，任何国家的复杂性都远超单一的叙事框架。对中国研究者来说，唯有放下偏见、打开视野，才能看见一个完整的世界。

第三，走进真实的生活。无论未来从事何种职业，都不要远离现场与人间烟火。真正有力量的知识，往往来自脚下的土地。只有保持对普通人的理解、对弱者的体察、对现实问题的敏感，研究才不至于成为空中楼阁。

“自天子以至于庶人，壹是皆以修身为本”。汉学的核心追求，我想皆可由此窥其大义。能够与中国学界、中国民众在同一文化源流中求索，也让我想起唐代诗人张九龄的名句：海上生明月，天涯共此时——跨越地域与文化的距离，共享着同一轮智慧之月。

汉学源自中国、属于世界，是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。汉学研究从来不只是书斋中的学问，它承担着连接中国与世界、促进不同文明相互理解的重要使命。

“新汉学计划”不仅让我精通了一门语言，更让我学会用语言去理解一个复杂的文明。汉学之“新”，有待你我共同探寻；汉学之“大”，更应由世界共同享有。

古籍今读

《百家姓》里的秘密：

一次对和平的抉择

牛建宏

“赵钱孙李，周吴郑王……”这8个字，大部分中国人从小都会背，但你要问凭啥这几位能站前排？估计很多人都不明白。2026年开年大戏《太平年》中讲到，南唐官员李元清退隐江湖，开始编写《百家姓》，因为他姓李，所以将李放在前面。

这当然只是剧情演绎。真实的历史，远比这复杂，也远比这深沉。

《百家姓》谁编的？

关于《百家姓》的作者，南宋学者王明清在《玉照新志》里写道：“市井间所印《百家姓》，明清尝详考之，似是两浙钱氏有国时，小民所著。何则其首云‘赵钱孙李’？盖钱氏奉正朔，赵氏乃本朝国姓，所以钱次之。孙乃忠懿之正妃，又其次则江南李氏。次句云‘周吴郑王’，皆武肃而下后妃，无可疑者。”

一个“小民”编出了流传千年的《百家姓》？听起来不可思议。王明清虽没道出具体姓名，却把“赵钱孙李”的排序逻辑分析得明明白白：赵是宋朝国姓，必须站C位；钱是吴越国姓，作者作为“吴越打工仔”，自然要把老板的姓放第二；孙是吴越王钱弘俶正妃的姓；李则是隔壁南唐的国姓。

简单来说，前四个姓就是“当朝大老板、本司大老板、老板夫人、隔壁公司老板”的组合，作者的排位顺序可算得上是“职场生存指南”。

这8个姓凭啥打头？

王明清还指出，“周吴郑王”也大有来头——这都是吴越国历代国王嫔妃的姓氏。查查《吴越备史》和《十国春秋》，确实能找到这些姓氏的踪迹：钱穆的庄穆夫人姓

吴，就是“陌上花开，可缓缓归矣”典故中的那位女主角；钱元瓘的恭穆夫人姓马，他的妻妾中确实有郑氏、王氏的记载。至于周氏，钱穆的母亲就姓周。所以“周吴郑王”这四位，虽然不是清一色的正宫娘娘，但个个都是王室里的重要女性。

但有反对意见说，这些周氏、吴氏、郑氏、王氏都不是王妃，而是侧妃。假如果真如此，那为何不用王妃，而用侧妃呢？这在礼法上说不过去。

这就引出了一个更有趣的《百家姓》编者候选人。根据朝鲜人的说法：1778年，朝鲜官员李德懋出使北京，回国后写了一本《八燕记》，提出《百家姓》的作者，很可能是吴越王钱弘俶的小舅子孙承祐。

这个孙承祐可不是一般的“关系户”。他不像《太平年》剧中演绎的那样，是黄龙岛主俞大娘子的儿子，但他确实是吴越王妃孙太真的弟弟。此人精通《易经》、爱好文学，还能带兵打仗——在吴越时曾和南唐打过仗，归宋后又曾跟着宋太宗北伐契丹，也算是少见的文武双全的人才。以他的身份和学识来编写一本启蒙读物，是完全说得通的。

对和平统一的纪念

还有学者推测《百家姓》的作者可能是钱弘俶的弟弟钱弘俶。此人文笔了得，写过《吴越备史》。公元978年，钱弘俶“不忍以一邦之民，久陷涂炭”，做出“纳土归宋”的决策，这既是对“善事中原”祖训的恪守，也是对强大中央政权和统一趋势的理性承认。正是这一决策，使富庶的江南地区免于战火，数百万生灵免遭兵燹——这是钱弘俶最大的历史功绩。

在这样的背景下，钱弘俶编这样一本启蒙读物，不仅能教孩子识字，更像是一封深

情的“纪念书”——纪念那场超越个人得失、以和平方式完成的统一，纪念一个王族为了苍生大难而放弃江山的抉择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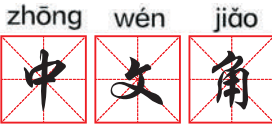
于是，《百家姓》以“赵钱孙李”开头：“赵”代表对大一统的尊崇，“钱”是对故国的不忘与告慰，“孙”承载着王族的血脉记忆，“李”则是对昔日南唐的体面告别。

千百年过去，朝代成了灰烬，帝王成了符号，唯有这些姓氏，依然在每个孩子的晨读声中，生生不息。

那位不知名的作者——无论是孙承祐，还是钱弘俶，或者只是一个普通的吴越书生——用一本薄薄的识字书，完成了一次最深沉的文化寄托。他让一段和平统一的历史，化为唇齿间的日常节拍，代代相传，永不磨灭。



第十届中国国际版权博览会上的“甲骨文百家姓”。新华社记者 李紫恒摄



2026年7月1日，是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。二十九载潮起潮落，维多利亚港的碧波依旧澄澈。这座因港而生、因港而兴的城市，始终静立在祖国南海之滨，枕海而眠，向海而兴。一个“港”字，藏着中国人千年亲水、治港、兴海的智慧。

汉字是活的文明刻度。一个字的诞生，对应着先民脚步所及的疆域。“港”兼是形声字和会意字，无甲骨文、金文遗存，篆文字形见于宋代徐铉等人共同校订《说文解字》一书时纠正讹误的《新附字》。也就是说，“港”是中原文明拓展至滨海后才形成的后起汉字。这是因为，甲骨文脱胎于商代黄河中游文明，彼时中原先民从未亲见真正的海洋。因此甲骨文中所有水部汉字，皆为内陆水系的注脚：“河”为黄河专称，“江”特指长江，渡口谓之“津”，全然不见港湾相关的概念。

《新附字》中注解：“港，水派也。从水，巷声。”左为水旁，昭示依水而生的属性；右为巷字，喻指蜿蜒曲折的临水小径。所谓港，不是汪洋奔涌的壮阔，而是江河分流、地势迂回形成的安稳水湾。自古至今，凡有港湾处，便有舟楫往来、人烟聚落、商贸兴起。

香港之名，便源于这般烟火与诗意。古时岭南盛产莞香，香气清雅馥郁。港岛南部的石排湾，水深港阔四季不冻，是天然良港。各地莞香先汇集尖沙咀，再转运至港岛南部石排湾，然后销往中原与南洋。船来船往沉香浮动，“香港”之名由此而来——意为芳香萦绕的海港（此为主流说法之一）。

从香江极目远眺，华夏1.8万公里大陆海岸线如弯弓舒展，大小港口星罗棋布。经过数十年建设，我国已形成五大港口群，构筑起全球规模最大的现代化港口体系，货物与集装箱吞吐量连续多年稳居世界第一。

这份成就的背后，是对先天不足的奋力超越。全球优良港口多依托岩质海岸，而我国约22%的海岸曾被国际公认为“建港禁区”——淤泥质平原海岸，土质松软承载力极低，极易发生地基沉降与航道回淤。曾有西方专家断言，在这样的海岸上不可能建成深水大港。

先天禀赋有限，便以科技补其不足。天津港的真空预压技术、宁波舟山港的大直径钢管桩桩端注浆技术……一代代水利运科研工作者深耕江海，为中国港口建设提供了核心技术支撑，保障港区建设安全、通航顺畅。

南海之滨的钦州港，同样是向海图强的生动注脚。这片早在汉代便是海上丝绸之路重要始发港的水域，拥有西南海岸难得的天然深水岸线。如今的钦州港将随着2026年9月即将通航的平陆运河成为江海联运的关键节点，将西江水系与钦州港无缝衔接，让其辐射范围从沿海延伸至西南内陆，西南货物出海航程缩短约560公里。

从香江的沉香古渡，到天津港的淤泥新生，再到钦州港通江达海的壮阔图景，变的是港口的规模与形态，不变的是华夏民族与水和谐共生的智慧——顺应自然规律，以匠心与科技攻坚克难，将先天劣势转化为发展优势。

二十九载香江归渡，潮起东方正当时。香港的港湾，是祖国万里海疆的缩影；无数超级港口的崛起，是中国与水共生、向海图强的最好见证。无先天最优水土，却有不屈匠心科技。一江一港，一河一海，皆是山河底气，亦是大国风华。

（作者单位：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）

本报南宁电（记者张云河）广西外国人才“一站式”综合服务平台暨外国专家书屋近日在南宁启用。该平台旨在为来桂工作的外籍人才提供全周期、集成化服务，是广西健全外国人才服务体系、优化涉外人才发展环境的新举措。

广西外国人才“一站式”综合服务平台由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组织部统筹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联合教育、科技、公安、卫生健康等部门共同建设。

该平台全面推行外国人来华工作“一件事”集成服务，线上建设信息平台，线下设立服务专窗，实行“一窗受理、集成服务”。外籍人才可通过平台办理科研人才项目申报、职称评审、社会保险等事项，开展政策咨询、委托代办和陪同协办服务。

同步启用的外国专家书屋汇集多语种书籍，涵盖中国国情、中华文化、广西发展、行业专业、人文历史等各类读物，不仅提供舒适的阅读空间，还将定期举办政策宣讲、文化体验、学术沙龙等活动，打造中外文化交流的“暖心驿站”。

作为中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，广西正加快建设区域性人才集聚区，打造面向东盟的人才交流合作高地。近年来，广西持续优化外国人才来华工作许可、社保、创新创业等服务，深入推进外国人才服务保障综合改革试点，努力营造“近悦远来”的国际人才发展环境。

「港」字背后的大国风华

杨林

广西推出外国人才「一站式」服务平台